

2016/8

中国社会科学文摘·目录

总第 152 期 每月 1 日出版

编委会主任

王利民

编委会副主任

余新华

编委会委员

(按音序排列)

丁任重	段超	方光华
冯小双	付子堂	耿显家
郭贵春	韩东育	韩震
柯锦华	何勤华	李放
李红岩	李琳	李新烽
李友梅	刘兴全	梁华
林跃勤	路育松	罗中枢
马敏	梅新林	任平
沈壮海	舒建军	宋冬林
孙长智	孙麾	田晓明
王广	王利民	王小锡
王兆胜	魏长宝	吴振武
谢寿光	杨耕	杨林
余新华	原正军	翟锦程
张萍	张一兵	张政文
郑成宏	周介铭	周群
赵磊		

主编

余新华

常务副主编

柯锦华

副主编

李琳	梁华	舒建军
冯小双	李放	周群
赵磊	魏长宝	

本期值班

赵磊

▲ 特稿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必修课

王伟光(5)

▲ 热点聚焦

党领导立法的实现方式 汪习根 宋丁博男(7)

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 刘伟(9)

城镇低保政策的再分配效应 陈宗胜 文雯 任重(11)

人口转变背景下的风险家庭问题 陆杰华 汤澄(13)

现代养老服务新模式:智慧养老 朱海龙(15)

民间资本参与养老服务的优化路径 郭林(16)

▲ 前沿

伦理视域中合成生物学的利益与风险 欧亚昆 雷瑞鹏(19)

英国新左派的工人阶级主体思想 陈治国(21)

▲ 学人与学林

侯外庐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治史路径 于佳彬(23)

梁漱溟后期思想的精神旨归 樊志辉 刘晶(25)

詹姆逊后现代超空间理论及其意义 黎庶乐(27)

▲ 马克思主义理论(栏目主持:李放)

历史唯物主义:概念史的学理考察 杨耕(29)

马克思宗教本质观辨析 汪信砚 李成龙(31)

马克思总体观视角下的国家治理现代化 胡承槐(33)

毛泽东人民话语建构的创新逻辑 周建伟(35)

当代中国“社会现代化”的动力机制 鲍宗豪(37)

生态意识的确立与生态文明建设 于冰 王洪新(39)

规范的社会生成与文明发展 林剑(41)

▲ 哲学·宗教学(栏目主持:柯锦华)

马克思技术思想的叙事范式 吴书林(43)

技术进步与制度变迁互动分析 杨发庭(45)

从“数学与善”的关系看科学哲学 蔡仲(46)

维特根斯坦与奎因的哲学相互兼容 A.拉格著 李浦群译(48)

正义的不同情境及其证成 马庆(50)

作为一种生活哲学的休闲学 庞学铨(51)

“阴谋家”:老子何以被诬 邓联合(53)

文化回馈:以“佛教中国化”为例 张志刚(54)

CHINESE SOCIAL SCIENCE DIGEST

▲ 文学·语言学 (栏目主持:李琳)

- 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国形态”探讨 胡亚敏(56)
- 艺术与游戏在意义世界中的地位 赵毅衡(58)
- 兴味蕴藉:中国艺术品的本土美质 王一川(60)
- 中国“关键词批评”的发展新变 黄擎(62)
- 江山有待:建构物候诗学的思考路径之一 廖美玉(64)
- 六朝文学之“江南”意象的历史生成 葛永海(66)
- 先锋文学的终结与幻化 张清华(68)
- 当代乡村叙事中乡贤形象的变迁 李静(70)
- 何谓语言竞争 李宇明(72)
- 论汉语名词性并列结构的“欧化”说 宋文辉(74)

▲ 历史学 (栏目主持:周群)

- 从微观到宏观:历史人类学视角的转变 陆启宏(76)
- 衰败论:中国环境史的误判及其评析 赵九洲(78)
- “土司文化”的定义、内涵与边界界定 李世愉 罗维庆(80)
- 从手艺人到天才:文艺复兴时期艺术家的身份与形象建构 刘君(82)
- 昭和天皇与日本败降 曾景忠(84)
- 跨国史的兴起与20世纪世界史的重新书写 王立新(86)

▲ 经济学 (栏目主持:梁华)

- 中国进口商品结构变化估算:2000—2014 魏浩 赵春明 李晓庆(88)
- 从生命周期理解我国的收入不平等 赵忠(89)
- 既定收入条件下消费者支出均衡的决定 陈惠雄(91)
- 人力资本: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因素 周必或 翁杰(93)
- 近代中国农业合作金融中的悖论 易绵阳(94)
- 中国工业的长期表现及其全球比较:1850—2012 徐毅 巴斯·范鲁文(96)

▲ 政治学·公共管理 (栏目主持:李放)

- 建构新型国际关系的中国思想逻辑 门洪华(98)
- 社会民主型福利国家对自由主义的超越和局限 朱旭红(100)
- 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风险防治 张博(102)
- 城市空间弹性治理方式 陈忠(103)

▲ 国际关系·军事学 (栏目主持:舒建军)

- 国际秩序理论再构 阎学通(105)
- 亚投行的国际组织属性及其杠杆作用 刘柏 张艾莲(107)
- 东亚外交文化的演变 陈维新(109)
- “上海进程”的地缘政治意义 许涛 王明昌(111)
- 巴黎事件与欧洲穆斯林问题 肖河(113)

建构新型国际关系的中国思想逻辑

《世界经济与政治》2016年3期,20000字

■ 门洪华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中央领导集体大力推进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引领中国全面融入国际社会并力争发挥更大的国际影响力,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征程。

21世纪是合作的世纪,一个国家能否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积极的建设性作用,主要取决于该国能否站在合作立场上处理问题,坚持正确义利观,做到义利兼顾,讲信义、重情义、扬正义、树道义,而不是沿用传统的霸权方式追求本国利益。

中国的国家定位建立在对五千年文明史、百年屈辱史和中国崛起的认知基础上,体现出鲜明的大国地位追求。1982年以来,中国的国家定位处于变迁之中,从传统大国到现代大国、从封闭大国到开放大国、从一般大国到重要大国,渐进定型。这具体体现在:

第一,中国的制度定位是新型社会主义大国。中国是现有大国中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这种制度定位彰显出中国的特性。与此同时,中国又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社会主义大国,而是通过对中国传统的继承、世界潮流的把握、社会主义国家发展史的反

思、国家发展目标的诉求等,逐步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内涵,从而确立起鲜明的新型社会主义大国的特征:和平的社会主义大国、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全面开放的社会主义大国、致力于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大国、致力于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大国。中国坚持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但不同于马克思恩格斯当年所设想的社会主义和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中国借鉴资本主义文明成果和市场经济模式,但未被资本主义同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种新型社会主义大国的追求,调整与完善并行,是融合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优势的制度模式,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追求代表了中国对未来发展的把握和自信。

第二,中国的经济社会定位是发展中大国。党的十八大报告重申,“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重要经济指标(如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世界最大的货物贸易出口国、第三大对外投资国等)意味着中国经济地位处于世界前列,难以定位为一般意义上的发展中国家;而从经济社会发展平衡性、人类发展指数等角度看,中国又显然处于世界后列。当前的中国不再是典型意义的发展中国家,欠发达与发达特征并存,欠发达的范围在缩小,发达的范围在扩大。中

国集中出现了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全面转型。中国转型的明确指向就是现代国家体制的建立和现代化进程的完成,国情特征决定了实现以上目标困难重重,中国必须实现从不可持续到可持续发展、从不公平发展到公平发展、从不平衡发展到均衡发展的路径转变。

第三,中国的文化定位是传统资源丰富的文化大国。一般而言,国家现代化是经济现代化、制度现代化和文化现代化的结合,而后者是中国面临的“攻坚战”。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文化现代化滞后于经济现代化,文化体制改革尚处于初级阶段,而文化安全是我们面临的最深层的安全威胁。中国在文化上仍然是一个“大而不强”的国家,传统文化现代化的问题依旧存在,如何继承和发展丰富的传统文化资源是我们面临的重大战略性议题。中国文化的内在风险主要体现在:社会价值观被销蚀,社会伦理(social ethics)滑坡带来严峻的社会问题,传统文化的精髓弘扬不够,优良传统有待于进一步挖掘。

第四,中国的国际政治定位是负责任大国。承担国际责任是全球化时代对各国的根本要求,全球性问题的激增及其解决要求国家无论大小强弱都要承担责任,承担而不仅限于对内提供国内公共物品、对外遵守国际规范、维

护国际准则、履行国际义务的责任。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综合国力居于前列的大国、东方大国,中国对维护全人类共同利益负有重要责任。“负责任大国”是顺应潮流、主动承担责任的国际诉求与建构。承担更重要的国际责任是中国实现自身国家利益的需要,是中国在国际社会中发挥更大作用的切入点,是中国国家利益走向全球化的重要路径。

第五,中国的战略定位是具有重大世界影响的亚太大国。当前,中国的国际影响力延伸至整个亚太地区,全球影响力迅速上升,亚太地区的所有重大事务,没有中国的积极参与则难以获得满意的结果。中国具备成为世界大国的诸多条件,但人均资源短缺、经济发展不平衡、文化价值观影响力有限,尚缺乏足够的海外利益和被国际社会所公认的世界性特权。因此,中国的战略定位是具有世界性影响的亚太大国,这一定位以地区性为基点,兼具世界性的特征。

随着中国时代的来临,理论自觉、理论自信成为一种现实的诉求,推动着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创新,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是对传统国际关系理论的反思与超越。

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基于中国的思想文化传统,是中和思想的当代弘扬。一个国家的国际关系思想理论本质上带有对全人类终极关怀的性质,但必然植根于该国的历史、文化和思维方式,无不带有其自身文化的特质。在战略文化上,中国传统文化追求“不战而胜”的境界,统一、安定、和平始终是中国传统战略文化的主旋律。战略的

底蕴和根基是思想文化,而道德主义则是中国传统战略文化的重要品格。

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秉承和合理念、以和为贵的和平思想,强调“物之不齐”的客观存在,抱持“既以为人,己愈有;既以与人,己愈多”的大国胸怀,坚持正确义利观,遵循合作共赢的路径,寻求与世界各国构建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的目标,表达了承担更多国际责任和义务的担当,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在当代条件下的积极弘扬。

20世纪70年代末迄今,中国通过国际合作融入国际社会,进而影响和塑造世界,逐渐走出一条以合作方式实现崛起的和平发展道路,为构建中国国际合作理论提供了丰富的实践和积极的探索。中国国际合作理论起步于新中国成立之初。改革开放之前,中国奉行以国际斗争为指向的合作思想;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国际合作理论从经济合作起步,逐步向低度国际政治领域延伸,进而向安全合作层面发展,逐步形成了全方位的国际合作构想。与西方国际合作理论的秩序偏好不同,中国不仅寻求国家能力提升和国家形象重塑,更要融入国际社会,通过融入国际社会、参与国际秩序,成为被国际社会所认可的成员,推动国际秩序公正合理的变革。与西方合作理论通过权力、制度和文化等体系因素实现合作不同,中国的合作注重内外结合,即对内加强能力建设,对外依托融入进程,把合作建立在学习交流、规范法治与构建集体认同的过程之中。概言之,中国的国际合作思想以变革自身为基础,

以融入国际社会为路径,以渐进为核心方式,以内外兼修推动国际合作的展开与深入,体现出后来者应有的谨慎和大国应有的气度。在融入国际社会的进程中,中国逐步确立了自己的战略定位,提出了合作共赢的重要思想,进而完善了自己的理论架构。

具体地说,首先,中国国际合作理论以命运共同体为指向。命运共同体的基本内涵在于,坚持各国相互尊重、平等对待;坚持合作共赢、共同发展;坚持实现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坚持不同文明兼容并蓄、交流互鉴。其次,中国国际合作理论以共同利益为基础。国际合作以共同利益为前提,全球化的加速发展为共同利益的增长创造了物质基础,中国谋求与世界全面合作,将中国自身发展融入世界的整体发展,在推动国际合作中创造更好地维护国家利益的途径。再次,中国国际合作理论以共赢为目标,以合作取代对抗、以共赢取代独占是新型国际关系的新意所在。最后,中国国际合作理论以积极承担大国责任为重要条件。中国深刻认识到中国崛起的全球震动,申明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强烈意愿,提出欢迎其他国家搭乘中国发展列车的倡议,致力于与世界各国发展友好合作关系,强调合作者的地位平等,并致力于分享发展红利,适当让渡非战略性利益,积极承担大国责任。

(作者单位:同济大学、中国战略研究院,原题《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中国的责任与担当》,李放罗浩摘)